



中国史家
论苏联
四种

徐天新 著

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

PINGDENG QIANGGUO DE LIXIANG YU SULIAN DE SHIJIAN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平等、强国的理想 与苏联的实践

徐天新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徐天新著.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 1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ISBN 7-81052-757-6

I. 平... II. 徐... III. 社会主义建设—研究—苏
联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691 号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 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

徐天新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58
发行部 0551-5108397
电子信箱 ahdxxch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王先斌
封面设计 张 犇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76 千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757-6 / K·57

全套定价: 148.00 元
本册定价: 37.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徐天新，1934年生。主要从
事苏联史和世界现代史研
究。1954—1959年在苏联列宁
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指导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研究
人员共二十多人。主持国家教
委社科基金项目《欧洲统一的
思想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国际冷战中的大国战略
关系研究》。先后获国家教委
优秀教材奖，北京市高等学校
教学成果二等奖以及北京大学
科研奖、教学优秀奖和教材优
秀奖。曾任中国苏联史研究会
秘书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
历史卷编委。主编出版了《世
界通史·现代卷》、《世界通
史·当代卷》（人民出版社）、
《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
版社）。参与《俄国通史简
编》、《苏联史纲》、《斯
大林模式研究》等著作的撰
写。发表了论文二十多篇。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序

长期以来,中国的苏联史研究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天下,从论点到史料差不多都取自这本“经典”。我国对苏联历史进行独立的、科学的研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事。坏事变好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认真反思和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和诸多问题。错误是我们自己犯的,但从源头考察却是同斯大林模式分不开的。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了对苏联历史的艰难而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本丛书的作者郑异凡、徐天新、叶书宗和杨存堂(笔名柳植)四位教授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有大体相同的特点: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有比较扎实的基本功,能较为熟练地使用俄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有献身于这一学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正因为这样,在我国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在三中全会的鼓舞下,他们对苏联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在报刊上、学术会议上,就苏联历史上的各种问题,诸如列宁晚期思想、斯大林模式、十月革命、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农民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现代化、对外政策、卫国战争、大清洗及布哈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史人物评价诸问题提出不少颇有价值的新见解。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过程。一个问题的研究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这里既有思想解放的问题,也有能接触到的史料问题,甚至还有当时社会环境对提出的论点所能接受的程度

问题。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在起步阶段能看到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而某些人的头脑还在“作茧自缚”,这直接影响到成果的发表。1984年,我曾借《世界历史》发表郑异凡的一篇文章之机写了一篇短评,叫作《没有必要作茧自缚》,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随时代的推移和实践的积累而发展。历史科学也不例外,要勇于并且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选择新的历史课题,对多年争论不休或者不敢问津的老问题提出新的答案。实践证明,在苏联史的研究上,人们的头脑一旦摆脱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束缚,就是根据不多的资料,也能得出新的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某些论证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显得单薄或者不够充分,也许某些论点会引起过学术界的争论,但是,随着资料的发掘,特别是苏联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随着对问题研究的深入,在许多问题上史学界逐渐取得了共识。当然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完全消除不同意见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我很高兴,在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80年代,有一批包括这四位学者在内的有志于苏联史研究的所内外学者就苏联史上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共同切磋,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在我国形成一个颇具实力的研究群体。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刻苦钻研,他们各自在研究课题上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专著。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他们二十多年来发表的文章选编,^① 这些文章有不少曾经对我国理论界、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对恢复苏联历史本来面貌发挥过重要作用,推动了我国苏联史的研究。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又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结合苏联和俄国的历史,总结一个大国解体、一个大党丧权的教训,评析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事件和现象,苏联史的深厚功底使他们在这一

① 郑异凡已经出版了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苏联解体期间的文集《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所以郑异凡的《史海探索》只收苏联解体以后的文章。

方面的文章也有其独到之处。

文化需要积累。为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保存,为使后来的学者能看到他们的成果,保持史学研究的继承性,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本书的出版。这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举措。对历史的认识、对问题的探讨永无止境。这四位学者的文集所反映的是我国对苏联历史探讨研究的一个阶段的历程,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相信随着新档案资料的发表,随着认识的加深,在俄国和苏联历史的研究领域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史学作品问世。

朱庭光

2003 年 12 月

前 言

我一生都在学习、研究苏联历史,经历了一个艰辛而又曲折的过程。

1949年解放军开进北京城时,我十五岁。原本是一个按部就班学习的中学生,一下遇到那么多的新奇、诱人事物,完全被吸引进去了。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学习了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历史后,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开始认识世界,认识革命。正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我决定学习历史专业,为革命摇旗呐喊。

在国内和苏联的大学学习期间,我先后三次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思想完全被禁锢在这本斯大林主义百科全书之中。不想,在寒冷的列宁格勒遇到苏联五六十年代的“解冻”,开始知道了一些新东西,但茅塞并未真正打开。

1959年大学毕业回国,正遇上庐山会议批判右倾,第二年又碰到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风浪中常被颠簸上下,自己虽小心翼翼地追随领导,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天就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揪出挨斗。但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也使自己对政治斗争有所了解。学习历史二十多年后,总算开始对历史有所领悟。

“四人帮”倒台后,专心攻读历史特别是苏联史,渴望了解历史真象,如实阐述历史事实。但每走一步都很艰难,都要同头脑中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争论较量。

最初遇到的是斯大林的地位作用问题。新披露的史料表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并不是处在列宁之后的第二把

手地位,也称不上是列宁的得力助手。他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如何对待临时政府、如何对待旧军事专家等重大问题上犯有错误。列宁病重后,斯大林更是在一系列问题上背离列宁意愿,以致列宁提出要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登上第一把手宝座的历史中,在领导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在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事务中,更是错误严重,甚至犯有罪行。这些确凿的史实实在令人吃惊,但经过冷静思考后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因为这些问题毕竟是属于斯大林个人的。阐明这些问题虽有很大难度,需要仔细斟酌分寸尺度,似乎尚能进行。问题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什么能把苏联历史篡改成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历史?科学的苏联历史应该如何阐述?还能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把苏联历史的中心红线甚至全部内容归结为阶级斗争史,归结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历史,归结为共产党战胜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吗?如果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一基本核心思想出发,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自然是先进阶级的代表,正确路线的代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至少是不该过分非议的。可是,历史已经表明,斯大林犯有重大原则错误,斯大林模式落后于时代要求。显然,斯大林并不是时代的先锋。那么,斯大林还能称作革命导师和领袖吗?如果不能,是否应该另寻一位真正的阶级代表、人民的救星,以充分展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进程?我陷入困惑,不知如何用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苏联历史,不知如何理解阶级斗争学说。由此,开始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依据的“阶级斗争学说”、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产生怀疑,进而发现问题,发现了大问题。

首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似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再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实际上,世界是五彩缤纷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依存、相

互斗争的综合体。除了阶级斗争外,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人类的主要活动,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文化传统更是不容忽视的内容。而个人和偶然因素常常会发挥巨大作用。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也产生着一定影响。如,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时,首先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然后说到“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①最后才得出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因此,不阐明俄国经济政治的落后情况,不具体讲那些与阶级斗争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传统,就不能深刻理解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不能深入说明为什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能对这一段历史进程起那么大的作用,为什么二月革命后俄国工农大众的情绪会发生那么剧烈的变化,会在几个月内由拥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民主”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又如,不讲俄国的村社传统,不讲十月革命后村社的发展,就不能说清农业集体化为什么错误严重却能贯彻执行,而且没有发生布哈林所担心的大规模农民骚乱。又如,不剖析斯大林的个人文化修养和性格品质,就无法讲清斯大林模式的特点。总之,历史的内容极其丰富,绝不仅限于阶级斗争。上述诸因素都各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同阶级斗争规律没有直接的关联。它们不仅是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起着关键或决定性作用,推动或阻碍着历史的发展。形象地说,人类的历史画卷绝不仅限于红白两色,更不会仅有界限分明的纯正的红白两色。其他的颜色,各种层次、深浅不同的颜色无时无地不在,多数情况下会占据画面的大部分,有时还会成为主导的颜色。

其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似乎它就是好与坏、对与错的斗争。一方是绝对的正确,永远的正

^① 列宁:《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列宁全集》,第29卷,90页,1985,第2版。

确；另一方则是绝对的错误，永远的错误。实际上，世界上的事物是非常复杂的，连精密的自然科学也不是绝对的，爱因斯坦就提出了相对论；社会现象更是没有百分之百纯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并非总错，毫无可以肯定之处。俄国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平分土地纲领，就曾被布尔什维克党采纳，被苏维埃定为法令。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也是值得称赞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领袖不是神，犯错误是难免的。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只在一处讲到党的失误而且只是策略上的失误，即党错误地抵制了第一届杜马选举。其他问题都闭口不谈，特别是对斯大林的重大原则错误更是讳莫如深，甚至还把他的错误说成正确，把失败说成胜利。似乎斯大林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必然是真理的化身，他的指示是绝对正确的、惟一正确的，历史就是按他的意志、按他的指示前进的。这种把阶级斗争简单归结为好坏对错误斗争的做法常常会把人引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歧途。

第三，在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简单化的基础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进一步把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庸俗化，似乎只要确定人物事件的阶级属性就可以判断是非好坏；反过来说也行，只要确定人物事件的好坏对错就可以判断它的阶级属性。这种一等于二、二等于一的分析方法实际是混淆是非。当难以或不便说清人物事件的是非好坏时，就用所谓的阶级属性来搪塞、来骗人，当说不清或有意歪曲其阶级属性时，就用一些所谓的好坏对错的事实确认其分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了说明斯大林的一切做法都是绝对正确的、惟一正确的，就把所有反对斯大林的人、同斯大林意见不一样的甚至不积极支持斯大林的人和意见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反动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都被认定为资产阶级代表，而且还是外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从一开始就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可是，这些人曾经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号领导人，

苏俄红军的创始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政府的首脑,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而他们为什么会是资产阶级代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没有说了。如果说斯大林的政策是正确的,因此是无产阶级代表,而反对他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代表;那么,今天看来布哈林的政策更正确些,是否可以說布哈林是无产阶级代表,而斯大林是资产阶级代表呢?当然,谁也不会接受这个结论。不过它说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站不住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虽然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却没有认真研究划分阶级的标准,没有认真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位置,而是把它变成替斯大林模式辩护的工具。

总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把分析历史的有力武器变成歪曲伪造历史、欺骗人民的工具。它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帜,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把虽有贡献但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斯大林描绘成值得崇拜也必须崇拜的救世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是那么深远,以致在批判个人崇拜之后,一些人还以阶级分析为由继续盲目赞颂斯大林,而不愿下工夫探求历史的真实;甚至把实事求是的分析说成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把主观编造说成是“无产阶级党性”。

在初步认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错误之后,彻底摆脱它的影响特别是学会科学地阐述历史,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尚未结束的漫长过程。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阶级分析方法”,使我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它。长期以来,学习研究历史时总是首先看一个人物事件的阶级属性,似乎结论也就由此而确定了。如,一看到农民起义就会说它推动历史前进,但由于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又必然失败。不管是古今中外的哪一次农民起义,都可以这样分析,也都必须这样分析。似乎历史就是这么简单,历史研究就

是这么容易,只要揭示出“历史的发展规律”就行了。似乎历史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朝着一个既定方向前进,就像在黑格尔哲学中那样,历史不过是绝对观念的展开。现在看来,这种简单庸俗的阐述既是对历史的否定,也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歪曲。马克思说:“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① 恩格斯说,“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② 才能说清历史,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很显然,研究历史不应从公式和概念出发,而要以史实为依据来进行,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但社会上,有些人却违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先根据某种需要定出结论,然后随意摘取编排史实,撰写论文专著。更有些人不做学术研究却经常挥舞大棒,用大帽子压人,以掩饰自己的无知无能,以图通过打击他人来抬高自己,获取名利。这种不良的学术风气使《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阶级分析方法”获得继续生存的土壤,使真正的史学研究困难重重。对于我来说,还有一层困难,那就是我的史学以及整个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以及外文水平都不够。以我的条件,要彻底抛弃这种既简单易行又稳妥保险的“阶级分析方法”,真正做到科学地研究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常常是力不从心的。我现在只能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不敢说已经做到,或许我一生都达不到这一境界了。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阶级分析方法”派生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如说“本质决定一切”、“大方向是对的”、“新生事物难免犯错误”等等,常使我感到困惑,不知应该如何对待它。乍一看,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不结合具体情况做深入分析,而是抽象地引用或加上一些随意摘取的事实但实际仍是抽象地引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3页,1995,第2版。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2卷,39页,1995,第2版。

用,往往就会使人无所适从,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如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依据同希特勒德国达成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占领了波兰等国的大片领土。这本是一件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但一想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苏联不会侵略别国,就不知应该如何分析这一事实,不知是揭示它的错误好,还是掩饰问题甚至肯定它好。又如讲到农业全盘集体化,很容易以它符合消灭富农阶级、改造个体农民的大方向而肯定它,进而不敢彻底揭露全盘集体化中的问题,害怕走偏方向。但进一步想,消灭农民阶级、限制并取消市场经济是否就符合大方向呢?姑且不论这点,单就全盘集体化实施的时机、手段、政策、代价和后果而言,也很值得探讨。因为这些因素并不因大方向对了,就变得无足轻重,就不需要认真分析、评论。相反,它们不仅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方向的正确与否。正如,人是要死亡的,病人尤其是要死亡的,但帮助甚至强迫人死亡并不一定符合大方向,并不一定对,还可能是大错,是罪行。很显然,对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需要做的是具体分析,而不是用抽象的大方向来做简单的定性,更不应用大方向来限制对问题的探讨。至于说到新生事物难免犯错误,更使我坠入云里雾中。首先,什么是新生事物?现在世界发展很快,许多事物都是第一次出现,都可以说是新生事物。按这种宽泛的界定说新生事物难免犯错误,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如果按严格的定义讲,那标准又是什么?自然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究竟是新生事物还是历史倒退?看来,确定是否是新生事物并不简单,它需要历史实践来检验,而不是反过来,按新生事物的界定来编排历史实践。其次,对错误本身的性质和大小、对主客观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都需要做具体分析。泛泛地讲不仅说不清问题,而且会混淆是非。如把斯大林在30年代滥杀无辜的行为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生事物难免发生的事情,就不仅掩饰了斯大林个人品质和斯大林模式的严重问题,而且是把斯大林的罪行归结到无产阶级

级专政上去了。总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阶级分析方法”所派生出来的许多说法似乎能帮助人抓住问题的实质,实际把我引入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的歧途,以为得到许多真理筐子,只要装进一些史实就是研究成果了。为了走出这一可笑可悲的处境,为了走出困惑、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我仍需不断努力,也在不断努力。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通过它的“阶级分析方法”将历史变成政治教科书,它这样做自有其社会历史的道理。我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也由于社会历史和个人的原因,长期以来同政治学工作者特别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几乎没有区别,弄不清历史同政治有什么区别,以为历史特别是苏联史就是政治,没有把握好、履行好自己的史学工作者职责。如社会上有些人争论斯大林及其继承人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当然关心这一争论,但它终究不是史学家的任务而是理论家、政治家的事。我更应关心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具体是怎样创建和发展变化的。如“五年计划”究竟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斯大林在制定过程中做过哪些指示,起过什么作用?“五年计划”规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托洛茨基“超工业化”计划的要求,那么斯大林工业化同托洛茨基“超工业化”的区别又是什么?消灭富农政策是怎样出台的?富农被流放到哪些地方,是怎样被流放的?各地有多少人,处境如何?诸如此类问题很多,都值得史学工作者具体研究。更有一些人争论十月革命是否应该发生、必然发生。可是,历史的真实是十月革命已经发生,而且是在俄国群众热烈支持下顺利实现的,探讨它该不该发生有什么意义?再说,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群众当时拥护的事,说历史已然发生的事不该发生?或者把具体的历史事件用宿命论的观点说成是理论规定的、必然发生的?这两种评论实际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教科书的正反两种翻版,都是俨然以历史大法官的身份来判定历史,来说教群众,而

非研究历史。这一情况引发我思考历史同政治的关系。尽管历史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不能脱离政治,史学工作者应懂得政治,但是,历史并不等同于政治,史学工作者也不等同于政治学工作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是史学研究的范本,我不应把政治宣传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我深感自己在史学方面做得太少了,在当今苏联档案大量解密的情况下,更加加倍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学习研究苏联历史过程中,农民问题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深感农民是俄国的基本群众,农民问题是俄国历史的主线,即使在苏联时期也是这样。列宁说过:“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际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①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党以建设社会主义为自己的时代使命,但关键问题却是探索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途径。列宁、斯大林谈的最多的也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工人问题。

俄国农村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存在着村社。土地定期重分,生产统一轮作,管理自治,联合保护,救济赤贫。在此基础上,建立“平等王国”成为俄国农民世代代的理想,也是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追求。斯托雷平改革执意要摧毁村社,扶助富农发展,遭到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原来曾批判民粹派思想,反对社会革命党的平分土地纲领。但到1917年革命高涨时期,转而支持平分土地政策,革命胜利后更严厉打击富农和脱离村社的农民,全力扶持村社复兴。苏维埃政府还把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分化等同起来,把实行社会主义和实现平等视为一回事。由此,“平等王国”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更落实于苏维埃经济政治之中。应当说,这

①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列宁全集》,第42卷,4页,1985,第2版。

一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并不全对,更不能绝对化。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中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分化加快了。布尔什维克党于1929年决定停止新经济政策,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集体农庄的建立,形式上消灭了村社,实际上村社的平等传统不仅继承下来了,而且发展到了顶点。村社内的平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平等:土地和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国有,生产管理由国家统一安排,分配由国家监督。在党和国家面前,在封闭的农庄内,大家的地位基本相同,即人人都必须劳动,一切都听从组织安排,生活一般有保障,且水平相似。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农民的平等理想,满足了他们的现实的和心理的要求。但是要做到无差别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它违背客观发展规律。人为地强行这样做,必然引发严重后果。首先,它主要是依靠暴力手段来实现的,是用消灭数百万富农、打击众多善于生产经营的富裕农民、把所有农民的生产资料充公的办法来实现的。其次,它是一种消极的、畸形的平等,具有极大的弊端。它只注意结果的平等,而不关心起点的平等,使人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向下、向最低水平看齐。为了维持人为的平等,它反对竞争,否定市场价值规律,打击生产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使社会缺乏活力。同时也反对个性发展,限制民主权利,使人日益异化为工具,共处同一地位。它限制彼此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来往交流,维护小单位内的平等,使人们眼光短浅,社会封闭。最后,这种平等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平等,人民群众与特权阶层之间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差距明显扩大。

布尔什维克党在创建“平等王国”的同时,努力把苏联建成一个“军事强国”。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国家的安全以及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最终建成只能靠消除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从而为迅速建成军事强国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斯大林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是最先进的,说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是推动它国革命的基地,苏联的利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